

學海奇人魯實先

李振興

中國傳統將學問分爲訓詁、詞章、義理三類。三類各有各的研究範疇，各有各的學術地位，彼此相互攻訐顯得無謂多餘。詞章姑且不論，義理一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够自立門戶的像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教授幾可謂著作等身，他們的學術地位無疑將被肯定。而訓詁一類兼包考據，能够繼承清儒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等餘緒，而突破他們的牢結，似屬鳳毛麟角。魯實先教授在訓詁一類的學術地位被學術界肯定顯然也無庸再置喙的。在古典訓練一代不如一代，有人竟認爲線裝書要丟進茅坑，有人認爲訓詁考據是抱殘守闕，而肯定全盤西化是富國強兵的不二法門。而一般缺乏定力主見望風披靡的滔滔皆是，在這種視傳統爲洪水猛獸的時代背景，對訓詁考據尙能固執孜孜矻矻，焚膏繼晷的毅力苦行，更讓人景仰，因爲搞訓詁考據，既無名利可圖，更需要具備忍受寂寞的韌韌。

魯實先教授還歸道山多年，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如何，在窮鄉僻壤，因爲資料欠缺無法窺知，僅僅就他的著作和十幾年前選讀他的「文字學」、「鐘鼎文」等課程耳濡目染的薰陶，勾繪一二，藉以表現對他的懷念。魯教授早期的著作有「殷曆譜糾譌」和「史記會注考證駁議」，晚期則有「假借溯源」、「說文正補」等，另有「殷契

新詮」、「文字析義」及「轉注」等，因手頭無書不詳，僅能從他的早晚期四部著作揣測而略敘其大綱，詳細評介有待於方家。

特殊著作出任教授

「史記會注考證駁議」是魯教授廿八歲獲得復旦大學教授資格的著作。不要說魯教授沒有博士碩士的頭銜，他自謂連基本的中學文憑也沒有。如果在目前的制度，沒有相當的學歷，恐怕永遠與講師無緣，更遑論教授。稍微對「史記」有涉獵的，都知道有三家的詮釋——唐司馬真的「索隱」、張守節的「正義」和宋裴驥的「集解」。而後歷代研究「史記」的專著論文可謂有如過江之鯽，罄竹難書。日人瀧川資言著的「史記會注考證」可謂集大成。對「史記會注考證」目前尙有零星的駁斥。而魯教授的「史記會注考證駁議」却是他未滿卅歲的著作。他認爲「史記會注考證」是有七項缺略——(一)體例未精、(二)校勘未善、(三)采輯未備、(四)無所發明、(五)說疵謬、(六)多所刪錄、(七)去取不明。魯教授認爲補注「史記」必須仿照裴(松之)注「三國志」、顏(師古)注「前漢書」的體例，混合史事與訓詁兩端。而瀧川資言却依王先謙的「補注」體例。雖說王氏曾以鄒遠元的「水經」疏證「漢書」的「地理志」

見知於學者，可是他的「後漢書補注」的疏略，却也無法掩飾。魯教授的「駁議」對史事仿照馬融的「釋史」而更加詳細，稽參的書目擴及方志家乘，旁及異邦典籍。他認爲於「太史書」外，應另加四類附錄——圖表、金石、殷虛文編、序論。而「駁議」對訓詁的態度却認爲前賢箋釋累累，無煩復贅。有關典章制度，名物禮儀等具存舊策，無庸詳錄。魯教授引段玉裁的話：「校勘不在一字一句不誤之難，而在審定底本之難。」認爲校勘決非像市坊書賈就版本比讎、記文字同異而已，校勘必要博考羣書，而後對文字、聲韻，「定其得失而通其義」。否則妄改正文，強加校語，徒令讀者「心亂目迷」。而「駁議」一書的重點放在「無所發明」、「立說疵謬」兩項，篇幅佔該書十之八九，因爲全屬專家行話，冗長不擬詳敘。「史記會注考證駁議」被推崇爲「略舉綱維，持論精審，多發前人所未發。」魯教授被讚譽爲「於經史百家，旁及二氏星歷之學靡不通貫。凡有叩難，應答如響。每論一事，輒至數千萬言，類皆自道胸臆，不拾唾餘。」詢非虛言。魯教授另有「史記廣註及歷表諸稿」(見「駁議」書末的「跋」)因篇幅所限不作介紹。

重考殷曆駁董作實

「殷曆譜科謬」是貶斥董作賓(彥堂)的「殷曆譜」。魯教授早年在重慶便寫成「殷曆譜」，對殷曆這門專家學問可謂成一家之言。董氏在撰寫「殷曆譜」以前著有「殷代月食考」，他的理論是參酌中西學者專家的週期論，從而論定月食的週期為九十三年。他的整部「殷曆譜」便是以「殷代月食考」構成的骨架。董氏計劃利用殷墟卜辭編「殷曆譜」以前曾書面向魯教授請示意見。魯教授認為王國維(靜安)打算利用殷商銅器的銘文考定年月固然不對，後人再以殷商銅器的銘文推斷陰曆而辨正王氏的錯誤也是不對。董氏曾寫「西周年曆譜」，魯教授又提出「西周年曆譜祛疑」。董氏曾從堯舜起一直下來編出歷代的紀年表，魯教授又針對提出「答教育部問中國歷史年表」。「殷曆譜科謬」、「西周年曆譜祛疑」和「答教育部問中國歷史年表」三篇文章發表後都沒有獲得董氏的答覆。其實僭曆法年表這種專門學問，不要說外行的人，就像傅斯年(孟真)的博學碩彥，竟也對董氏「殷曆譜」推崇為「集文獻的大小總匯，用新法則原蓋精緻，曆日與刻辭渺不合，曆法與古文若符契，殷商二百七十三年之大紀，燦然明白而不誣矣。」讚譽董氏為「發乎勇，成乎智，質諸後人而無疑，俟之續書史料而必合。」魯教授却非常不客氣以專家的態度貶斥董氏的「殷曆譜」是非常的荒謬。他認為後人利用殷墟卜辭推定殷商的年代是行不通的道路，因為殷商的曆法早就失傳。如果依據後世的曆法推定殷商的年代，如何能够正確。何況殷商帝王在位年數根本不能考定，即使拼湊卜辭

也常常有錯誤，這一項理論基礎既然不能成立，股商的曆法推算自然也沒有立腳的根據。於是魯教授因為董氏無法答覆他的三篇文章，便不客氣指交董氏「不懂曆法」，連曆法的基本常識都缺乏。他編的『股曆譜』，可以說是極無知識的一本曆譜。他對於甲骨文，誤解文義的地方也很多。因此說，他這本書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不了解背景的人，或許會認為魯教授的口氣高傲，但是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有沒有學問是無法騙人的，因為歷史是最佳的見證者。

嘔心瀝血的鉅著

「假借溯源」、「說文正補」等應是詮釋許慎（叔重）的「說文解字」的一系列且是魯故授徒畢生嘔心瀝血的鉅著，讀者必先識字，識字須明六書。六書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說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本文九三三五三，重文一六三。崇文總目列有李陽冰判定「說文解字」二十卷，久佚不傳。現今傳世者，唯徐鉉校定本與徐鉉繫傳。乾隆嘉慶，研究樸學專事家蜂起，依據二徐詮釋「說文解字」者不下數十家，其中「訂謬補遺，發明許義」的有朱駿聲輩的「說文通訓定聲」、王筠的「說文釋例」和桂馥的「說文義證」等，而能够以「許書說解為經，羣經傳注為緯」而融會貫通，卓然有成的首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許慎自鉉六書的義例有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上下）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

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歸，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也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記事，令長是也。」許氏釋六書的體例是首列其名，次釋其義，絡繹其六書的名稱，次序，歷來衆說紛紜，姑且存而不論。然許氏對六書的詮釋舉例，殊嫌「言簡例陋」，且又失諸偏頗、虛謬、晦澀等。而魯教授更剴切指陳「說文解字」的五闕五誤。所謂五闕是指闕其部、闕其字、闕其形、闕其音、闕其義。所謂五誤是指分部之誤、釋形之誤、釋義之誤、類例之誤、歸入之誤。魯教授爲「匡謬補逸」於是他的「假借遡原」、「說文正補」等便是他的具體學術成果。而歷代學者對六書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比較沒有尖銳對立的爭辯。而對轉注、假借則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一是的混局。而魯教授對轉注、假借的見解詮釋，益見他「緣貫之博，用心之精」和「自古學無師成能，能自樹立」的孤心苦詣。爲證成其說，個人不揣陋陋，再詳敘一二。

轉注假借闡發精密

文字所以表達語言，而語言又有古今之異，方域之殊。依據中夏雅言構造的文字，雖或有時異地移，但因語出同原，大類音相鄰近。縱有遷遞，必是韻變而聲不變，或是聲變而韻不變。故凡因音轉而草乳的轉注字，有屬雙聲，有屬疊韻而聲韻俱同的現象，因為聲韻俱同的屬於義轉的轉注字。音轉、義轉的轉注字俱同的屬於義轉的轉注字。

畫然易別，而歷來學者專家會訟紛紜，囿於不清的分形轉、義轉、聲轉等三派，義轉一派又細分為形聲、部首、互訓三支派，南嶺北嶺斷斷轉注，魯教授認為蔽結在於一般昧於說文自敘對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和轉注名稱的任意臆測，不知轉注的肇興在於換別假借的相觸及適應語言的變遷，和不能明辨文字的本義，並據許書的誤解而勉強湊合音義相同等三種因素。除杭章炳麟（太炎）的「國故論衡」曾釋轉注說：「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轉轉，疊韻相連，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魯教授激賞章氏「合許君之雅言，獨前修之臆謬。」可是對他對「建類一首」的類謂聲類，首謂聲首僅就聲音而詮釋轉注的說法却不敢苟同，認爲只是「得其一蹊而未知遡會」。於是魯教授提出精密周備的見解。他說：「所云『建類一首』者，謂造聲韻同類之字，出於一文。其云『同意相受』者，謂此聲韻同類之字，皆承一文之義而孳乳。轉謂轉移，注謂注釋。故有因義轉而注者，有因音轉而注者，此所以名之曰轉注也。」他雖出前人形轉、義轉、聲轉的窠臼，擺脫形聲、部首、互訓的羈絆，昭然釐定因義轉而注者有二種方式，一是存初義，以別於假借與引伸，一是明義訓，以別於一字兼數義。他說：「所謂存初義者，乃以初文借爲他義，或引伸與比擬而爲他名，因續造新字，俾與初義相符，此所謂存初義之轉注字。」又說：「所謂明義訓者，乃以語多同音，是以字或數義。覈其義訓，非一義之引伸，審其形聲，非他文之假借，爲

免義訓相蔽，因復別構一字，此所謂明義訓之轉注字。」

再敘假借。許氏「說文解字」敘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案本無其字指字形，依聲託事，託事指字義。所謂假借，就是本無此字形，但有字音、字義，不再別造他字，而僅依其音假借另外同音的字，以表達其義。許氏詮釋假借，但得其一隅，列舉令長，又誤以引伸爲假借。假借轉注既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駢列爲六書，那麼假借爲造字之準則，而非用字之條例，明著於劉向（子政）的「七略」，可謂千古不易的定論，而後代專家學者昧於師承傳統，謬倡「四體二用」之說，根本不明六書的底蘊。魯教授認爲假借本是造字的輔助條例，可別爲兩類，一是運用假借，一是造字假借。運用假借所以濟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無窮。換句話說，「轉注所以悉文字之孳乳，而運用假借則所以節文字之孳乳者也。」轉注必須音同義近，而假借僅取其同音而已。而造字假借則是依據運用假借之條例，在造字之初，依聲託事。有時因昧於本義而誤用，有時爲適合方言的要求，有時爲避免字形的重複，不得不使用假借。而運用假借，魯教授又細分爲無本字之假借與有本字之假借。凡是無本字之假借，後世有時別造本字，而借字，本字并行於世，有時借字義行而本字義廢而別造一字。有時借字義與本字義並存，而終未再造本字。凡是有本字之假借，是指本有其字，依聲託事，或同音假借，或雙聲假借，或疊韻假借。有時借字行而本字

廢，有時借義行而本義廢，有時同時并行於後世。

會意形聲真知灼見

其次再補敘魯教授對會意、形聲的一二真知灼見。衆所周知形聲字必兼會意，可是却也有例外，他歸爲四類，一曰狀聲之字聲不示義。二曰識音之字聲不示義。三曰方國之名聲不示義。四曰假借之字聲不示義。魯教授說：「明六書而通經史。」又說：「經緯已裂，是在通材，陶鑄通材，唯須熟讀舊典。明習文字，乃其造詣。」韓文公（愈）曾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綜觀魯教授的「假借溯源」、「說文正補」、「文字析義」、「殷契新詮」等鉅著，更可肯定古往今來聖賢並不寂寞。雖說有「經籍纂詁」，或是索引提要，檢尋便易，但是對魯教授的博聞強記，和旁徵博引的治學態度仍是讓後人佩服五體投地。兩漢以前舊典的傳注、箋釋不說，「方言」、「釋名」、「爾雅」、「廣雅」、「說文」、「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等類書不說，僅僅就最冷僻的卜辭彝銘的專業知識，恐怕他的成就將是空前絕後。魯教授治學的觸類旁通，更是驚人。就以卜辭彝銘的研究，如果不能忍受寂寞，像「三代吉金文存」、「殷虛書契」、「薛氏鐘鼎款識」、「殷契考釋」等令人望而生畏的書名，恐怕興趣就缺缺。魯教授不但能够忍受寂寞，進而悟出興趣，更奠定他的學術地位。

精力充沛自許甚高

魯教授的外形屬於短小精幹，走路姿態有如「西遊記」的孫行者，最讓人折服的是他的精力似乎永遠充沛，他的樂觀進取似乎世界永遠是春天，他的炯炯眼光鑒鑒有神含蘊無窮的智慧。如果說他有什麼缺點便是比較高傲、苛薄。但是如果比較寬恕的話，他具有他高傲的條件，他的對象必須苛薄，才能振弊啟聵。他常常調侃計慎的「說文解字」馬馬虎虎勉強派司 (Pass)，就是屈萬里 (翼鵬) 的國學造詣，也只能給他六十分。有人就問他的「說文解字」成績如何？他不疾不徐，臉不紅頭不粗地說：「魯某人，屈指第二，算九十五分。」因為古今聖賢，只有司馬遷 (子長) 是排名第一把交椅。據說他從不主動去拜訪別人，他恨透不肯腳踏實地，專注表面，有時課堂發脾氣，聲色俱厲當面驅逐別人出境。他又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踐者，他幾乎沒有會議席位的應酬，幾乎所有時間全部花費在書本，他的書齋，案牘席次全是攤開或未攤開的書本。據說有人向他請教「金瓶梅」涉及的干支問題，他便侃侃而談，見解的出人意表讓人張口咋舌。但是他說：「不敢，不敢，對於小說，我一竅不通。」他喜歡有實學、有良知，而又認真的讀書人。魯教授對近人的欣賞，也僅僅只有黃岡熊十力 (子真) 一個而已，他說縱然「熊真人」赤袒裸體還是屬於老聃的「赤子」。熊氏的談話和不修邊飾，尚未有第二人。他莫名其妙將名號對調，到底十力是名是號，子真是名是號，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說：「梁漱溟腦筋不清楚，是個笨蛋。馮友蘭不識字，亂作中國哲學史。」

胡適之提倡科學，但是他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金岳霖搞邏輯。其實所說是戲論。「試想梁、馮、胡、金諸氏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可說是各執牛耳的地位，他們却也不以為迂。熊氏當著湯用彤、牟宗三旁若無人地說：「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的都是混扯。」據說有一次梁漱溟挨熊某一棒，戴君仁教授就開懷地說：「他打你，就像小孩打你一樣。你想我們怎麼會去跟小孩計較呢？」對於魯教授那種旁徵博引和觸類旁通的治學方法，讓人想起蕭公權教授。以「Political Purita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中譯：「政治多元論」)「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譯：「中國鄉村」)和「中國政治思想史」諸書飲譽中外的蕭教授認為：「治思想史要求平正踏實。否則易流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境界。『要人為學不可炫奇蹈空。』與人說理，會人心中鉛頭心迷。」他認為治學要「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今心述。」偏激、傾軋都不是學者應有的風度，必須將古人的思想放置於歷史脈絡中加以考察，還古人原來面目是比較妥善的辦法。為學應折衷，中外不可偏廢。他說：「東海西海各有聖人。其心其理不必同。是此而非彼，都不是應有的態度。」在工業社會一切講求功名，一味理性化、世俗化。西方機械文明的存在絕望與自我毀滅。一般專著論文充滿圖書館的味道，根本沒有血淚和生命。而清末激情主義昂揚是罪魁禍首。魯教授提出「寫你最親切，最有感情的東西。」的針

砒。專著論文雖然要投入感情，但研究態度要抱著「寓情於理，以理制情」的態度，如此才不致讓感情廉價泛濫而不可收拾，樹立「情理均衡」的典範。歷代原儒學說雖千言萬語，却不外是「把人當人」，對人性的尊嚴和價值給予絕對正面的肯定。

遇事認真狂狷可愛

魯教授可謂「表裏如一人」，他的著作幾乎無頁不註，而且註又如註。雖不談學問而卒不免於談學問。據說他酷愛潔白，幾乎不能忍受鐵塵穢垢。凡是他看不慣的事，便破口大罵，但是如果罵錯，他又會認錯道歉。這與傅斯年、熊十力的性格相似，他們都是極其可愛的「真人」，古今中外凡是真誠形於外的真人，都難免在言辭得罪於人。有人批評說：「人謂十狂九鄙，而魯實先則卑鄙之尤者。」蜚蜚揚揚，徒見其妄不量力。不談「文字學」則已，如論當代「文字學」的重鎮，恐怕非魯教授莫屬。而世俗竟目為狂妄。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在功利洪流的沖擊，滔滔皆是炫奇蹈空，狂狷人物似成絕響，反而令人懷念扼腕。

參考資料

- 一、「魯賓先與殷屠諧」(莊練)
- 二、「魯賓先的人品學案」(魏子雲)
- 三、「說文類釋」(李國英)
- 四、「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墨子刻)
- 五、「歲寒大哲尤結髮」(黃俊傑)
- 六、「真八於十力」(阿國)